

奈格里诸众理论的生命政治哲学诠释

孙绍勇 刘慧芳

摘要 生命政治是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政治哲学探讨的重要议题。奈格里以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为理论资源,构建了诸众主体。诸众是被主导政治体所排斥却内嵌在社会生产中的多元混杂的贫穷主体。就内在机理而言,贫穷激发了诸众力量的身体要素,使生命潜能得到激活。事实上,生命潜能不仅是诸众生命政治主体性生产的前提,也是诸众实现自身解放的基础。作为直接掌管生死的权力,生命权力以无孔不入的方式对诸众的身体乃至意识施以精细且隐秘的控制,这就导致诸众的生产、生活乃至整个生命都受到生命权力的规训。与生命权力相对,生命政治是在地化生命的生产力量,孕育着主体性创生,并在生命政治生产过程中产生共同性。在生命政治框架下,诸众要实现自身解放,就需要占有共同性,形成“反抗先于权力”的意识,构建去中心化的共同体网络组织以突破生命权力的宰制,激活生命潜能。奈格里以生命政治哲学为理论基底构建的诸众理论,为唤醒诸众的主体性、探索生命政治实践路径提供了理论资源,但他忽略了生命政治本身也可能被资本吸纳并转化为新型控制形式的可能性,因而带有一定的理想化色彩。

关键词 奈格里;诸众;生命政治;政治哲学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6)05-0057-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3ZDA082);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项目(2024HZ0566)

在当代社会,随着全球化、信息化以及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多样。传统二元对立的阶级划分难以全面解释当前复杂的阶级关系,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质疑,甚至出现“工人阶级已经被资本主义文化彻底地‘收编’了”^[1](P182)的观点。因此,西方左翼学者试图寻求变革资本主义的新主体,如齐泽克的“新无产阶级”、朗西埃的“无分者”、阿甘本的“神圣人”等。奈格里则将新主体视为诸众。与传统西方左翼学者不同,奈格里突破了普遍将生命政治理解为生命权力对主体生命掌控的消极倾向,将其视为极具生产性的力量。在他看来,生命政治表征着生命主体的生成性与反抗性,蕴含着诸众摆脱生命权力宰制及实现自身解放的可能性。因此,只有从生命政治哲学维度对奈格里的诸众理论加以阐释,才能深入把握其庞大的思想资源与脉络,厘清诸众的生命潜能及其实现自身解放的实践路径。在此基础上,有必要结合数字资本主义的时代语境,对奈格里诸众理论的生命政治哲学向度展开总体评析,回应其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前瞻思考和理论张力,尝试为理解当代西方左翼思想中关于主体及其解放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提供思考路径。

一、诸众生命潜能的内在机理考察

在浩瀚的宇宙长河中,生命以其无尽的多样性和不可思议的潜能,成为主体存在及意义的永恒议题。“一个生命所包含的只有潜在(virtuel)。它是由潜在性、事件、独异性(singularité)组成的”^[2]。潜在并

非虚无,而是动态生成。生命就是动态生成的过程,并非由既定本质决定,而是通过潜在性、事件和奇异性的交织而创造性地生成的。诸众作为生命体,处于社会边缘,被社会权力结构忽视,但其生命潜能是自主活动和实现自身解放的基础。因而对诸众进行深入考察时,一个不可回避的哲学问题便呈现出来:诸众何以具备生命潜能?对这一问题的追问成为深入探究诸众存在本质的关键。

在奈格里看来,诸众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生成的多元主体,也是涵盖不同财产状况、身份、职业和文化背景的群体,包括“工人阶级、农民、移民、穷人等处在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条件下的一切劳动者”^[3]。就其构成而言,诸众由一个个繁若星辰的个体组成,不能被化约为统一的身份。不难发现,诸众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其具有的奇异性。在网络空间中,诸众的奇异性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并非同质化的个体,而是保持自身差异性的主体,具有形态各异的兴趣爱好和价值观念,并且自由地在社交媒体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共同构成了网络空间的多元主体。就其存在方式而言,诸众是在社会生活和交往实践中不断生成的开放性主体;同时,诸众也是生产的主体,因为“人既生产,也被生产”^[4](P136),诸众的生产是通过彼此的相互协作和交流形成的。就其政治使命而言,奈格里扩展了革命主体的范畴,强调诸众是新的社会革命主体,具有政治行动能力,是抵抗全球资本帝国统治秩序的生命主体。总体而言,诸众拓展了马克思的阶级范畴,将一切贫穷主体都包纳进去,构成了对抗资本帝国的新型主体。

奈格里提出:“穷人指的不是那些一无所有的人,而是那些无视社会秩序或财产状况、内嵌在社会生产中的广泛的杂多性。”^[4](P40)17世纪以来,作为穷人的诸众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力量,一旦达到目的就成为被管理和控制的对象。历史的多个要素共同决定了奇异性的诸众处于贫穷的状态,承受着不同程度的苦难,或财富匮乏,或精神遭受摧残。从根本上说,奇异性的诸众在于其原始的贫穷状况。马克思也对无产阶级的贫穷状态给予关注,认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5](P156)。穷人由于其生产的成果被无偿占有或被排除在财富之外,往往对现有的统治者和制度感到不满,甚至会拿起武器殊死反抗。这表征着穷人不仅仅是资本权力争夺的剩余物,生产与再生产条件下的囚徒,也是推动政治变革的关键力量。在马克思看来,贫穷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奈格里充分认识到诸众的贫穷状态,更进一步地挖掘贫穷的可能性以及贫穷蕴含的力量潜能。正如他所说的:“穷人的核心本质不在于他们的匮乏,而在于他们的力量。”^[4](P180)然而,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探源,奈格里则倾向于将贫穷的诸众与其身体的力量要素结合起来,将处于匮乏状态和充满可能性的穷人诸众的生产力转化为诸众斗争的力量源泉,充分挖掘了诸众这一生命体的力量潜能。

身体蕴含着不可估量的力量。奈格里认为,身体按其自身内在性质的规律可以做出很多事情。他在对身体的关注中发现了生命政治的力量因素,这种力量如果被加以利用就可能带来主体性的彻底改变。奈格里赞同梅洛-庞蒂提出的“身体本身在世界中,就像心脏在机体中:身体不断地使可见的景象保持活力,内在地赋予它生命和供给它养料,与之一起形成一个系统”^[6](P261)这一观点。无疑,梅洛-庞蒂看到了身体在感知、认知和交往互动中的基础性作用。不过在奈格里看来,马克思对身体的特别关注对于理解主体的现实境遇具有重要价值。马克思不仅将身体从传统哲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还赋予其社会实践及生产关系的核心地位。马克思认为,人的身体是感性活动的主体,是进行着感性活动的有机体,与人的感性活动紧密相连。同时,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身体被简化为商品,服从于资本增殖的逻辑。在马克思身体观的基础上,奈格里更进一步地将身体与活劳动融合在一起,把身体的力量向前推进。奈格里提出:“当我们以更为广泛的形式去理解劳动和生产,并将其置于生活的各个领域时,身体就不可能被消解,不可能臣服于任何超验的规则与权力。”^[4](P38)人的身体不是自为的客体,实际上是一个自发力量的综合。身体的内在性体现在它能够感知和体验世界,赋予世界以生命和意义。正是这种内在性使身体成为连接个体与世界的桥梁。

福柯通过对身体进行生命政治分析,激活了被权力笼罩的身体的反抗性。事实上,他聚焦于权力如何通过管理和规范身体来行使控制。在他看来,现代社会通过各种规训机构来控制 and 塑造身体。这些

机构包括监狱、学校、军队和医院等。“这些机构所创造的分工精细的部门围绕着人形成了一个观察、记录和训练的机构”^[7](P197)。最终,这些机构通过规范化的程序和技术来训练和监督身体,确保身体符合社会标准和期望。因此,身体被视为权力关系的物质基础,即权力不仅通过身体施加影响,而且通过身体来执行。同时,身体也成为权力作用和抵抗的场所。概言之,通过探源身体在生命政治中的成分,福柯深入分析了主体如何在社会中被塑造和鼓励发展身体潜能,以及如何通过身体实践来寻求自我实现和社会变革。如此看来,身体本身不仅仅是被动的刻写机器,有时也蕴藏着爆发性力量。阿甘本认为:“身体是一个双面性的存在:既是向至高权力屈服的载体,又是诸种个人自由的载体。”^[8](P170)奈格里也认为:“只有身体的视角及其力量才能挑战财产共和国所施加的规训和管控。”^[4](P27)因此,身体所蕴含的力量,既来自与他者身体的相遇和冲突,更源于其自身无限多样的器官构成的复杂内在关联,从而生成更为根本的、内生的强大力量。从这一意义上说,诸众是由其身体内在的生命潜能决定的,其能力不是通过外在赋予,而是由内在的身体激发出来的。换言之,在奈格里看来,诸众的生命潜能是生命体与生俱来的,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和创造力。当生命潜能被激发和释放时,诸众便能够展现出强大的力量。如此,诸众的生命潜能便成为其政治行动和自我解放的基础,其生命潜能的发挥便是参与生命政治生产以及夺取共同性的重要条件,也是实现主体性的基石。

二、诸众主体性的生命政治意蕴审视

在探讨主体性问题时,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生命权力对主体生产、生活乃至生命的深刻影响。生命权力以无孔不入的方式,对主体的生产生活、思维方式乃至价值观念进行精细而隐秘的控制。正如福柯所说:“权力首先是获取的权力:获取东西、时间、肉体 and 生命的权力。它在为了消灭生命而占有生命的特权中达到了顶点。”^[9](P114)同时,其也为诸众生命潜能的激发创造条件。当生命权力以某种方式触动这一开关,诸众的主体性便如泉水般喷涌而出,以更主动的姿态参与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生命权力的控制,抑或主体生命潜能的激发,所有这一切势必深刻影响诸众主体性的孕育发展。

生命权力的管控日益渗透至诸众的整个生命之中。在福柯那里,生命权力指的是,自18世纪以来,现代政治以一种新的策略和治理模式对个体生命进行管理和调节。“人们以某种方式试图使那些由健康、卫生、出生率、寿命、人种等这些在人口中构成的活人总体之特有现象向治理实践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合理化”^[10](P280)。具体而言,生命权力是通过各种手段对人口进行管理和调节,以实现社会安全、提高生活质量并确保社会整体的稳定。生命权力不同于传统的君主权力和规训权力。传统的君主权力侧重君主的绝对权威和惩罚机制,规训权力则通过规训和管制等手段来控制生命,以使个体的生命达到被驯服的现实有用的效果。奈格里认为,生命权力是指新自由主义下资本实施的权力,是直接掌管生死的权力,这里的生死,不仅是个体或群体的生死,也是人类本身和所有存在物的生死。这种生命权力如同一张巨大的网络,内嵌于社会机理,并在其中弥漫开来。不言而喻,“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那些权力强加给它各种压力、限制或义务”^[7](P155)。这使得主体在权力管控之下,其肉体和精神所受到的控制和束缚只能逐渐加深。

生命权力对共同性的腐化与对生命本身的控制逐渐增强。奈格里认为:“理解当下经济生产的关键就在于共同性,这既是一种生产力,也是财富得以生产的形式。”^[4](P280)共同性不仅指自然资源,如空气、水和大地等,也指共同的知识、语言、习惯和感情等。作为生命政治生产得以展开的基础,共同性成为资本争夺的对象。一方面,资本对诸众生命政治劳动的成果即共同性腐化。共同性不仅关涉财富的增长,也内嵌在社会结构中。共同性——如知识、信息、语言以及符码等的生产——使诸众的思维得到强化,能力得到增强。然而,一旦诸众生产共同性的能力得到强化,资本权力对诸众的掌控就会相对减弱。因此,为了维持自身统治地位不受威胁,资本便对诸众的共同性加以腐化,以阻止诸众与共同性的有益相遇及诸众自身能力的增强。一般来说,资本对共同性的腐化主要是通过强加等级制或者制造屏

障来阻止人们之间有益的交流、交往及彼此的相互合作。另一方面,资本对生命主体的全面渗透加剧。“资本主义生产正在变成生命政治生产”^[4](P133)。在奈格里看来,生命政治生产指资本主义生产已超越工厂围墙,渗透整个社会领域。生产不再局限于物质商品,而是直接塑造社会关系、知识、情感乃至生命本身。与以往生产不同的是,生命政治生产逐渐延伸到诸众的整个生命肌理,诸众逐渐失去对自我生命的掌控,导致诸众主体性的丧失以及自主性和创造性的消解。

生命权力的管控从个体逾越至整个群体结构。在福柯看来,规训权力针对的是个体的身体,旨在通过权力机制使人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在后福特主义里,活生生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价值正变得越来越非物质,越来越协作化”^[11](P92)。为了改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不再是简单集中于劳动组织和生活中的个别参与者身上,而是将生产的要素延伸到共同网络关系中。换言之,生命权力通过建立网络协作的关系、增强个体的相互依赖与彼此的休戚与共,使整个群体都受到控制,进而加强对所有生命体的管控与规训。因此,“这个新建立起来的技术,也针对人的群体,但不是使他们归结为肉体,而是相反,使人群组成整体的大众,这个大众受到生命特有的整体过程,如出生、死亡、生产、疾病等等的影响”^[12]。资本对诸众生命的掌控不仅是一种对个体生产的占有,也是对更大范围的占有和掠夺。在共同关系的联结中,资本的分配关系网络从个体转移至整个社会,整个群体都在无形中受到生命权力的支配。

生命权力对诸众的管控方式更为无形和隐蔽。在福柯看来,生命权力取代了传统的治理模式,跃升为一种新的治理技术。生命权力的支配地位表明,过去残酷的暴力手段已经不适用于新的治理模式。生命权力以一种更加无形和隐蔽的方式突出重围,构建起新的治理机制和策略。这一新的治理形式极大地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双重限制。一方面,诸众活动的空间不再受限。互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权力得以突破空间限制,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即时传递和高效运作。同时,虚拟空间的崛起为权力提供了新的平台,使权力能够在不受物理世界限制的情况下,对主体施展更为隐蔽和全面的控制。另一方面,诸众活动的时间日益模糊。资本对诸众的剥削不是减弱,而是更加深化,其不只是在固定时间的剥削,更延伸至劳动者生产和生活的整个生命之中。“在工业模式中,工人几乎只在工厂的工作时间内进行生产。然而,当现在的生产旨在解决一个问题、创造一个想法或一种关系时,工作时间往往会扩展到整个生命时间”^[13](P111)。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劳动过程已经逐渐渗透到劳动者的日常生活中。智能手机、电子邮件、即时通信工具等现代通信手段使劳动者即使在非工作时间也难以完全脱离工作状态。如此,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诸众的主体性更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不再能够完全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而是更多地处于一种持续的工作状态,从而使得资本对诸众的生产、生活乃至生命活动的统摄呈现出进一步加深的趋势。总之,生命权力已逐渐成为一种控制术,延伸到诸众的意识和肉体中,贯穿了全部社会关系。也就是说,所有的社会关系都被纳入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之中,整个生活都被资本权力笼罩。在此模式下,诸众的主体性受到资本的宰制,面临着被消解的威胁。

然而,生命政治不仅指向权力管控,同时也蕴含着主体性的创生以及生命潜能的激活。生命政治既是主体性的牢笼,也是主体性解放的试验场。生命潜能就是主体突破生命政治的牢笼,实现其生命本身的创造性、反抗性和超越性的力量。生命政治在当代西方左翼思想中的发展主要归于福柯。诚然,福柯并不是生命政治的首创者,但他却使生命政治具有了现实批判的力量。奈格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福柯的启发,将生命政治看作生命权力的对立面,开辟了当代生命政治发展的新阶段。为了区别于生命权力,奈格里的生命政治更加强调生命政治主体,而非仅仅是被政治过程影响的客体。主体通过参与生命政治生产来不断增强其自身的主体性,这使生命政治生产不再囿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也为诸众主体性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事实上,主体性不仅意味着诸众在与他者的互动中实现自身的自主性、能动性,也指向诸众自由个性的最终实现。从这一意义上说,奈格里的生命政治思想突出强调生命政治不仅仅是

权力对生命的掌控,而且蕴含着生命本身的创造性力量和解放潜能。

生命政治不仅是权力对生命的规训和治理,更是主体性创生的场域。在奈格里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命政治不仅是对个体生命进行管理,也是激活主体性的过程。生命权力通过一系列的机制和策略将主体的塑造和管理深入到生产过程中。这种塑造和管理不仅体现在对物质生产过程的控制,更深入生命政治生产过程之中,如社会关系的构建、文化认同的形成以及主体性的塑造等。然而,这种规训并非无懈可击,“权力也是生产性的——不只是外在于主体,行使禁止和压迫的力量,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从内部生产主体的力量”^[4](P80)。换言之,主体既是权力运作的产物,又在与权力的对抗中塑造自身。特别是在生命政治中,主体不仅在与权力的互动和对抗中重塑自身,也在与他者的互动中实现自主性。生命政治生产被视为诸众主体性的构成要素,也是主体性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主体在生命政治生产中孕育了合作与共享的可能,形成了相互协作的关系。在此意义上,主体的内在潜在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中被激发出来。

生命政治在将生命转化为生产性力量的同时,也使主体在权力网络的裂缝中激活内在的生命潜能。在传统政治治理模式中,资本和权力结构经常形成双重制约,主体往往采取直接对抗的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但易遭到权力的反噬。在生命政治治理中,生命权力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重塑主体的政治参与和社会治理。生命政治不仅揭示了权力对生命主体的深刻影响,还展现了生命主体在权力网络中的能动性与自我重构的创造性。在生命政治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奇异性的诸众构成了权力裂缝的异质元素。换言之,诸众不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参与自身生命创造过程的主体。他们通过彼此之间相互协作和社会运动等多种方式,不仅挑战了既有的权力结构,更在不断地尝试构建新的政治模式与社会形态。这种自我塑造的过程,既是对个体潜能的深入挖掘与释放,也是对社会整体进步的有力推动。因此,正是权力褶皱背后存在的裂缝,使主体能够打破生命政治现有的框架和边界,实现自身的主体性。

三、诸众解放的生命政治实践理路

奈格里的生命政治实践理路表征着生命从抽象走向现实,并在生命政治的实践中将原初的生命形式建构为崇高的生命形式。从根本上讲,诸众解放的生命政治实践逻辑就在于激活主体的生命潜能,增强主体的自我解放能力。因此,生命政治实践就是诸众解放的孵化器,揭示了诸众在重塑权力格局、激发主体潜能以及构建新型社会关系方面扮演的角色。从而,诸众通过生命政治实践获得主体性,具备摆脱外部力量束缚以及实现自我解放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诸众的解放并非外在赋予,而是诸众基于生命政治实践的内在生成。

其一,诸众实现自身解放的首要行动是夺回被资本占有的共同性。共同性既是诸众与自然互动的因素,也是诸众改造自然的结果。资本对共同性的剥夺导致生命政治的主体性生产受到阻碍。在生命政治生产过程中,主体性不仅仅是个体的内在特质,更是其参与社会生产、建构社会关系和展开政治实践的基石。生命政治生产充分利用了人类的身体、能力和知识,这些都是在工作中获得的,也是诸众主体性的构成要素。然而,诸众生产得愈多,被资本占有得就愈多。资本对共同性的剥夺,使诸众之间的生产协作网络受到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资本对共同性的占有阻碍了共同性的生产与再生产,使诸众的自主性受到限制。因此,共同性不仅需要得到维护,而且也需要夺回生产共同性的条件。正如奈格里强调的:“诸众的义愤和对抗不仅指向等级制和统治的暴力,而且也要维护共同性的生产力和相遇的自由。”^[4](P258-259)从根本上说,夺回共同性的重要环节就在于维护共同性的生成条件以及争夺诸众的自由和自主权。对共同性的维护就是鼓励主体自主参与生产过程,逐渐成为一个不受资本控制的、独立的以及相互协作的自由主体。奈格里认为:“只有当我们共享并参与到共同性之中,诸众的民主才有其可能。”^[4](Pviii)因此,摆脱资本对共同性的剥削就在于让诸众真正参与并共享共同性。这就需要“对共同

性——我们过去劳动的成果,以及未来的自主生产和再生产资料——进行再占有”^[14](P164)。奈格里将诸众摆脱资本剥削的对抗指向从资本关系中“出走”,即穿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豁口而结成新的关系。这里需要指明的是,“出走”并不是赤身裸体的离开,而是以退出现有关系和反强制合作的形式,拒绝资本强加的阻碍要素,夺回属于诸众的那部分共同性成果。

其二,诸众实现自身解放要形成“反抗先于权力”的意识。现代生命权力已逐渐转化为掌管主体生命的权力,渗透到诸众的无形机体之中。同时,这一控制力也包纳了全部社会关系。也就是说,所有的社会关系都被纳入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甚至主体的意识和整个生命都被资本权力笼罩,从而构成“生命政治事件”。在这个过程中,权力表现出强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那么,生命权力无处不在的渗透和无所不能地强加在主体之上是否意味着反抗毫无可能?福柯认为,权力是流动的网络,而非实体;或者说,权力是生产性的、弥散的、动态的关系网络。他反对将权力视为单向的压迫工具。在齐泽克看来,反抗可以超越权力体系本身,寻找更深层次的解放^[14](P264)。在奈格里看来,资本权力并非实体,它是依赖对活劳动的剥削而存在的。活劳动是财富的真正来源,资本权力只是对活劳动的捕获装置。活劳动在创造共同性时也不断溢出资本的管控框架。这表明,权力不只是对主体施加压迫,也是主体突破重围实现自身解放的重要力量。对诸众来说,把握自身的主体性首先就要破除禁锢在主体身上的心灵枷锁^[15],以一种先在的反抗意识武装自身。当资本统治渗透社会的各个角落时,诸众便进行全力反抗。

奈格里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技术控制不断稀释阶级意识。资本的权力规训模式不再局限于对肉体进行规训;相反,资本主义的“规训技术超越了肉体,进入了精神”^[16](P28)。规训的实施绝对内在于被监控之下的主体性。换言之,规训实施的并不完全是一种外在于主体、监控主体并凌驾于主体之上的活动,而更像一种融入主体意识和意志之中并与主体自身不可分离的内在动力。这意味着,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生产力。资本要提高生产力,就要对诸众的肉体乃至精神加以控制。由此,诸众在生命政治实践中无意识地卷入了资本主义的涡旋,整个生产、生活乃至生命都受到绝对权力的支配。随之而来的,便是主体成为屈从的主体,诸众面临主体性丧失的危机。因此,诸众的生命政治实践通过生命政治生产激活了主体内在的生命力量,将生命的生产转变为反抗、创生以及自由的行动,实现了新的主体性的创生,从而构建起反抗逃避管控的抵抗路径。

其三,诸众实现自身解放需要构建去中心化的共同体网络组织。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权力已从传统民族国家的垂直统治转向无中心、网络化的控制体系,即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帝国——正在形成。“与帝国主义相比,帝国不建立权力的中心,不依赖固定的疆界和界限”^[17](Pxii)。事实上,帝国的真实目的就是通过网络管理和调节多元混杂的主体,让诸众成为任其支配的对象。在奈格里看来,通往帝国的进程为自由力量的释放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换言之,帝国的统治也使诸众通过生命政治生产不断溢出资本的控制,生成与之相对抗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也是诸众通过生命政治实践编织而成的抵抗网络。需要明晰的是,共同体并非仅仅依赖单一的组织形式,而是由具有奇异性的诸众构成,通过主体间的平等交流和相互协作,如开源协作社区、互助合作组织、网络兴趣社群以及知识共享平台而形成的多元协作的共同体网络组织。

奈格里认为:“当我们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比任何单一个体都强大的共同体时,我们就是在建构一个新的、共同的主体性。”^[14](P180)然而,“人要发挥自己的主体性,须以社会和他人为中介,建立起交往联系”^[18]。主体性的发挥正是以主体及主体间的生命政治生产为中介,通过生命政治生产形成相互协作和交流的网络,使主体的自主性得到增强,自由的创造性力量得以实现。于是,当诸众汇聚成集体力量时,其主体性可以通过与他人的合作交流得到拓展。从根本上说,诸众在参与自身解放的生命政治实践时,其主体性也在进行生产。究其原因,诸众在参与社会的一般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其思想、知识和情感的生产,不仅创造了维持社会运转的条件,也直接生产了关乎诸众主体的社会关系和生命形式。正因如此,观念、图像、符码、情感和社会关系等生命政治生产的成果构成主体性的重要因素。在此实质意义

上,诸众的生命政治生产过程就是主体性得到改造的过程。因此,在生命政治实践中,诸众不断进行自我改造的过程,变革的不仅是外在的客观世界,更是主体的意识世界和生命形式。故此,“工人不再是资本家购买然后投入集体生产过程的个体;他们已然成为具有社会性的生产性共同体”^[19](P272-273)。这一共同体形式“不是私人或公众,也不是个人或社会,而是共同体——也就是说,我们所有人一起为人的再生产而构建的一切”^[20](P249)。

四、奈格里诸众理论的生命政治哲学向度评析

奈格里以诸众理论重构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将诸众视为对抗资本权力的生命政治主体。与以往西方学者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消极论调不同,奈格里从更积极的面向强调生命的生产性与创造性力量。然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奈格里诸众理论中蕴含的主体生命潜能、生命政治实践以及自我解放愿景呈现出内在张力。因此,从生命政治哲学向度对奈格里的诸众理论给予客观评析具有现实必要性。

一方面,奈格里从生命政治维度构建的诸众理论,是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创新性重构。“生命视域也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视角”^[21]。马克思强调:“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5](P519)马克思将现实的人视为生命存在的基本单位,将对其生命的考察扩展到社会生产与生活领域,由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在此基础上,奈格里精准捕捉到全球化与数字资本主义的时代特征,对主体进行了创新性重构,不仅揭示了资本如何渗透生活世界,也使主体性的内生力量可以在生活世界中生成,使主体的重塑拥有更丰富、更深刻的基础支撑。具体而言,奈格里将福柯描述的生命权力对生命的规训与管控,转向以生命政治为核心的对抗性范式。生命政治不再仅仅是权力运作的场域,更构成了诸众主体反抗生命权力的创造性实践。进而,他将生命政治与知识、情感、信息、语言等要素联系起来,深刻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命已不仅是被权力规训的对象,更是具有生成性与创造性的本体力量。与此同时,资本虽然控制生命,却也只有依赖生命主体的潜能与主体性才能运作。可见,奈格里将诸众塑造为超越了肉体生命的贫穷和被压迫状态,以及具有无限创造潜能的生命主体。其生命政治实践不仅表征着对抗权力的在地化生产力量,也蕴含着生命政治主体的生成逻辑,为当代西方左翼学者提供了批判资本主义的创新思路。

马克思根据所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将阶级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22](P32)。奈格里认为,传统的阶级主体理论建立在工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其分析框架难以完全适用于后工业时代的生产现实。随着知识、平台、算法等新型生产要素不断涌现,劳动的形式及场域发生改变,生产与生活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劳动过程趋于弥散化和生命化。在此基础上,奈格里将生产方式的转型逻辑延展至主体的构建层面,试图超越传统阶级理论的二元对立范式,提出更具包容性的“诸众”概念。必须指出,奈格里的诸众并非同质化的阶级,也不是简单的群体聚合,而是由内部差异化、共同承受资本权力管制以及参与生命政治生产的多元主体构成。从深层次的内在逻辑来看,奈格里的诸众理论不仅突破了传统以“劳动—资本”为中心的分析框架,引入生命、身体、情感、语言、信息等要素,从而构建起诸众生成—抵抗的逻辑链条。由此,奈格里的诸众理论既是对马克思“阶级”概念在全球化、信息化语境下的当代重构,也是对身份政治挑战的理论回应,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

另一方面,奈格里从生命政治维度构建的诸众理论,对透析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多元主体的现实境遇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一理论在揭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理论张力。奈格里对资本权力机制的批判在宏观上看似激进,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资本增殖逻辑的阐发却显得不够深入。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始终坚持从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生产资料所有制、剩余价值剥削等方面揭露了无产阶级被压迫、被剥削的被动地位。然而,奈格里虽然洞察到当代劳动知识化、协作化的

趋势,却将其普遍化为生命政治生产,进而将多层次、分化明显的多元利益主体整合为一个奇异性的诸众。大卫·哈维认为:“就与资本主义的延续来说,阶级比其他身份形式要更为根本。”^[23]诸众理论的构建,固然彰显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却在理论上淡化了阶级差异、劳动地位等实质性不平等,进而掩盖劳动者内部存在的剥削和压迫关系。最终,对资本主义最根本、最彻底的批判被大大削弱,从而难以充分解释当前多元主体内部的利益分化及根本冲突,生命政治解放的基础也存在着被瓦解的风险。

奈格里在着力阐发生命政治的解放潜能时,遮蔽了其潜在的新风险和新挑战。尽管奈格里高扬生命主体蕴含的创造性力量,却未能充分揭示大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正以无孔不入的方式进行渗透,将诸众的生命及其潜能重新置于一种新型的数字生命权力的规训之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诸众的主体性。生命政治既被视为压迫机制,又被视为解放力量,这种双重定位固然具有理论洞察力,但其内部的辩证逻辑并未充分展开,导致其在理论和实践上呈现一定的模糊性。奈格里强调,诸众的生命活动具有内在的反抗潜能。然而,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表明,资本不仅吸收生命活动,而且对其施以深度控制。平台资本主义利用算法分析、数据追踪、注意力捕捉和情感操控等手段,在更深机理层面对人的生命活动进行规制和塑造。相比之下,奈格里对资本主义的深层剥削逻辑缺乏充分的结构性分析。他认为,生命的生产过程自然具有反抗性,但现实中生命往往被平台逻辑重新塑造和驯化。诸众并不会因为生命的创造性就自然而然地进行抵抗,相反,生命更可能被资本吸纳乃至商品化。因此,奈格里的诸众理论具有明显的“自治主义”倾向,而他也因忽视了当代资本权力的制度性强制力和结构性整合能力,故在阐释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主体性的生成及其解放路径时充满理想主义色彩。

奈格里以生命政治哲学构建的诸众理论,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他敏锐地洞察到资本从生产领域向生命全域渗透扩张的趋势,生命政治由此成为现代权力运作的核心逻辑。然而,奈格里并未因此陷入悲观论调,而是试图在危机中寻找新的契机,尝试从生命政治层面激活诸众的生命潜能与主体性,将诸众视为能够抵抗帝国统治的新型主体。这种对主体性、协作性和创造力的肯定,使生命政治不再只是控制与规训的机制,也成为孕育反抗性与超越性的场域。尽管奈格里已离我们远去,但其诸众理论揭示的主体性重构逻辑和对未来政治形式的前瞻性思考,仍在数字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当下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尤其是,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技术促进信息共享与全球互联,使诸众能够激活潜能、增强主体性。通过在社交媒体、网络平台的发声、组织及动员,分享个人经历、揭露社会问题以及呼吁社会关注,诸众在网络空间构建起强大力量。同时,数字资本主义也带来数据监控、隐私侵犯和算法操控等问题,使诸众遭受新的剥削与管控。因此,回到奈格里并不意味着重复其思想,而是在批判性吸收其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在新的发展条件下继续探索如何激发主体的创造性力量,为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可能性方案。

参考文献

- [1] 马塞罗·默斯托. 今日马克思. 孙亮、杨小峰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 [2] 蓝江. 穷竭与潜能:阿甘本与德勒兹论内在性.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2).
- [3] 陈培永. 后帝国主义时代的革命主体建构——哈特、奈格里的“大众”理论辨析. 理论探讨,2011,(4).
- [4]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Commonwealth*.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莫里斯·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 姜志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7]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 [8] 吉奥乔·阿甘本. 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 吴冠军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 [9] 米歇尔·福柯. 性经验史:第1卷. 余碧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 [10] 米歇尔·福柯. 生命政治的诞生. 莫伟民、赵伟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11] 安东尼奥·奈格里. 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 尉光吉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

- [12] 蓝江. 一般智力的生命政治生产——奈格里的生命政治思想谱系学蠡探.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5).
- [13]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 [14] Slavoj Žižek. *The Ticklish Subject: The Absent Centre of Political Ontology*. London: Verso, 2000.
- [15] 孙绍勇. 后殖民语境下非洲文化传统创生的哲学反思. 世界哲学, 2024, (1).
- [16] 韩炳哲. 精神政治学. 关玉红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9.
- [17]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8] 孙绍勇. 交往理性的主体间性向度解析及当代审思——以哈贝马斯交往范式与交往实践旨趣为论域. 山东社会科学, 2022, (7).
- [19]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Labor of Dionysus: A Critique of the State-For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 [20] 安东尼奥·内格里. 超越帝国. 李琨、陆汉臻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 [21] 张海满. 马克思生命政治理论的可能性向度. 哲学研究, 2024, (6).
-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3] 大卫·哈维. 解释世界还是改造世界——评哈特、奈格里的《大同世界》. 王行坤译. 上海文化, 2016, (2).

An Interpretation of Negri's Multitude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opolitical Philosophy

Sun Shaoyong, Liu Huifang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Biopolitics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radical left-wing political philosophy. Negri, drawing on Foucault's biopolitical thought, constructed the subject of multitude. The multitude is a plural and heterogeneous ensemble of impoverished subjects embedded in social production yet excluded by the dominant political order. In terms of its internal mechanism, poverty stimulates the bodily elements of the multitude's power, activating their life potential. In fact, life potential is not only the premise for multitude's production of biopolitical subjectivity but also the foundation for their self-emancipation. However, as a power that directly administers life and death, biopower exerts meticulous and covert control over the multitude's bodies and even their consciousness in an all-pervasive manner, dominating their production, life, and entire existence. In contrast to biopower, biopolitics stands as the productive force of localized life and nurtures the creation of subjectivity. Within the biopolitical framework, for the multitude to achieve emancipation, they need to possess "commonality", develop the awareness that "resistance precedes power", and construct a decentralized community of network-based organization to break free from the domination of biopower and activate their life potential. Negri's theory of the multitude, based on biopolitical philosophy, provides theoretical resources for awakening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multitude and exploring the pathways of biopolitical practice. However, he overlooked the possibility that biopolitics itself might be absorbed by capitalist power and transformed into a new form of domination, thus lending his theory a certain idealistic tint.

Key words Negri; multitude; biopolitics; political philosophy

■ 作者简介 孙绍勇, 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陕西 西安 710072;

刘慧芳, 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涂文迁